

我国双重二元经济结构下 FDI 的异质性*

徐 清

内容提要 我国存在着双重的二元经济结构,这对流入我国 FDI 的性质有着重要的影响。本文的实证结果显示,2002~2009 年我国东部地区的外资利用以能带来更大技术溢出并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的水平型 FDI 为主,我国中部地区 FDI 性质不明确,而西部地区的外资利用则以垂直型为主。门槛回归结果显示,我国各地区不同的金融发展水平、对外依赖度以及国家干预程度对流入我国 FDI 性质都存在明显的门槛效应。

关键词 刘易斯拐点 二元经济结构 垂直型 FDI 水平型 FDI 门槛回归

作者单位 南开大学经济学院

中图分类号: F12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6964 [2013]01-120629-0359

一、双重二元经济结构与 FDI 性质转变

联合国贸发会议 UNCTAD(1998) 将 FDI 分为市场寻求型、资源或资产寻求型和效率寻求型。Markusen (1995) 则将 FDI 分为垂直型(出口导向型)和水平型(市场导向型)。使用垂直型投资的跨国公司其母公司与东道国子公司是纵向一体化的关系,母公司利用母国的资本、技术比较优势进行产品研发与设计,子公司则使用东道国廉价的劳动力进行技术低下的产品组装生产,生产的最终产品主要用于出口,因此垂直型 FDI 能促进东道国的出口;水平型 FDI 则是为了获得东道国的市场,其在东道国建立与母国公司保持水平分工关系的分公司,分公司能独立完成生产与销售,生产的产品主要在东道国销售,因此水平型 FDI 对东道国的出口并无促进作用。相反,水平型 FDI 还可能对垂直型 FDI 有挤出作用,这会抑制东道国的出口。当然垂直型与水平型 FDI 并不一定是互相独立的,UNCTAD(1993) 提出混合投资的概念,即跨国公司根据利润最大化原则,将生产的各个环节与销售分布在不同的可以创造最大利润的国家。混合型 FDI 即利用东道国的比较优势要素,也在东道国销售产品,因此混合型 FDI 对东道国的出口效应并不确定。

2010 年我国利用外资的规模达到了 1057.35 亿美

元,我国利用外资的排名也从改革开放前的第 60 名上升到 2010 年的第 2 名。我国的外资主要来自于周边的香港、澳门、台湾地区以及韩国、日本等国,这些外资的性质以资源寻求型为主(文东伟、冼国明,2009)。20 世纪 60 年代和 70 年代,我国的香港、台湾地区以及韩国、新加坡等亚洲新兴国家以出口导向战略获得了快速发展,这些地区有将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出去的动机,这种动机形成的 FDI 主要以垂直型为主,而我国双重二元经济结构正好为承接这些劳动密集型的产业提供了有利的条件。首先,我国是刘易斯(1954)提出的相对发达的城市部门(或工业部门)与相对落后的农村部门(或农业部门)并存的二元经济结构,要转变二元经济结构就必须实行城市化。1982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明确提出了“允许农民进城”的政策,大量的农民工从农村涌入了城市形成了规模巨大的“民工潮”。但由于劳动力供给与需求的不平衡,我国城市的工资水平十分低下,这就为我国承接韩国、日本等国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创造了非常充分的条件。其次,我国的东部地区由于地理优势与我国改革开放政策的缘故,成了承接这些垂直型 FDI 的主要地区,我国东部地区也因此获得了快速的发展。但这也造成了我国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经济

* 本文受到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11YJC790202)和广东省软科学项目(2011B070300091)资助。

发展的不平衡。因此,我国不仅存在着刘易斯二元经济结构,也存在缪尔达尔(1957)提出的发达地区与不发达地区并存的二元经济结构。区域上的二元经济结构使得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的工资水平差距不断扩大,工资水平的差距使得中西部地区的劳动力不断流向东部地区,中西部地区渐渐地沦为东部地区的劳动力供给腹地。

但我国以劳动力比较优势吸引垂直型 FDI 的状况在 2004 年左右发生了转折,2003 年起我国一些主要城市先后出现民工短缺现象。这不仅是我国二元经济结构发展的转折,也是我国利用外资方式的转折。首先,东部地区在改革开放后基于劳动密集型产业以及出口导向战略获得了巨大的发展,东部地区的 GDP 在 2010 年达到了 250 542 亿元,同改革开放初相比增长了一百多倍,因此东部地区的市场规模足以吸引水平型以及混合型 FDI 的流入。其次,东部地区由于经济增长带动了劳动力成本的上升,这使得东部地区劳动力成本的比较优势逐渐丧失。同时,在我国“中部崛起”以及“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指导下,中西部地区劳动力向东部地区的转移开始减缓,甚至发生了劳动力向中西部地区回流的现象。因此,对于东部地区,其对垂直型 FDI 的吸引力正在下降,其利用外资的方式也在转变。而中西部地区,由于经济发展落后,地区的工资水平较低,虽然其地理位置并不利于垂直型 FDI 的选择,但由于东部地区劳动力比较优势的丧失,国外 FDI 必然将垂直型 FDI 的目标转向中西部地区。

二、我国 FDI 性质的实证检验

1. 计量模型与数据

文东伟、冼国明(2009)通过构建垂直型 FDI 的理论模型指出,垂直型 FDI 更容易发生在劳动力成本差异大、运输成本低的国家之间。颜银根、安虎森(2011)认为,FDI 流入与进口贸易是替代关系还是互补关系,主要取决于国家或区域间的贸易自由化水平。薛漫天、赵曙东(2007)使用动态面板数据模型,分组判别了流入我国 FDI 的性质。他们认为,总体而言垂直型 FDI 在制造业吸收的 FDI 中占据主要地位。周文波(2010)认为,国际贸易与国际直接投资之间的关系正从早期的完全替代向部分替代以至相互促进和相互补充的方向发展。国际贸易与国际直接投资作为经济全球化的两种重要表现而具有越来越强的不可分割性,二者间联系将愈发紧密,呈现出相互融合、交叉发展的轨迹。李季、赵

放(2011)认为,在 FDI 成本与贸易成本较低条件下,当两国存在资源禀赋差异时,FDI 会引起两国间垂直型产业内贸易。李宏艳(2008)认为,跨国公司在我国 FDI 的增加,使我国参与垂直专业化的程度加深。

从国内学者对流入我国 FDI 的分析可知,流入我国 FDI 的性质同我国的资源禀赋、劳动力成本、贸易自由化水平等都有关系,我国 FDI 同贸易之间是替代还是互补关系也同 FDI 的性质有关。这些研究大都是对我国整体的分析,而没有考虑到我国东部、中部、西部的地区差异,对普通的小国来说区分不区分地区分析并无多大影响,但对我国这样地广人大的大国,尤其是在我国存在区域二元经济结构的情况下,分地区分析就更为必要。本文选取 2002 ~ 2009 年我国省级面板数据,分地区来检验我国 FDI 的性质。当流入我国的 FDI 是以垂直型的资源寻求型为主时,FDI 会促进我国的出口;当流入我国的 FDI 是以水平型的市场寻求型为主时,FDI 无法促进出口,甚至会抑制出口。计量模型如下:

$$export_{it} = \alpha_0 + \alpha_1 fdi_{it} + \sum_m \alpha_m z_{it} + \eta_i + \varepsilon_{it} \quad (1)$$

$$export_{it} = \alpha_0 + \alpha_1 fdi_{it} + coast_i + \sum_m \alpha_m z_{it} + \eta_i + \varepsilon_{it} \quad (2)$$

其中 η_i 为个体效应,控制不可观测的不随时间变化的变量。 $export_{it}$ 为 i 省 t 期的出口额, fdi_{it} 为 i 省 t 期实际利用外资金额; z_{it} 为控制变量,包括 $masi_{it}$ 为 i 省 t 期的市场规模,以各省的生产总值表示,市场规模越大,产出也越大,在相同出口比例下,出口规模也越大,预期系数为正; $open_{it}$ 为 i 省 t 期的开放度,用进出口总额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例表示,开放度越大该地区对外贸易的倾向也越大,其预期系数为正; $avwa_{it}$ 为 i 省 t 期的制造业的平均工资,制造业是出口主要部门,因此其工资水平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出口企业的成本水平,其水平上升对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出口竞争力有较大影响,对资本密集型产业的影响则不能确定; $capw_{it}$ 为 i 省 t 期的劳均资本,用各省的资本形成总额比去年末在岗职工表示,其控制了各地区资本与劳动力的比较优势,从直接影响看,根据 H-O 比较优势理论,各地区出口相对密集要素生产的产品,所以资本密集地区的资本要素比例上升有利于出口,相反,劳动密集型地区劳动力比例上升有利于出口; $cosat_i$ 为 i 省至海岸线的距离,借鉴黄玖立和李坤望(2006)以及 Ge(2003)的做法,其计算公式为 $coast_i = 100 / (\min D_{ij} + D_{ii})$,其中 $\min D_{ij}$ 为各省到最近的沿海省份的距离, D_{ii} 为各省的内部距离^①,距离海岸线越远,出口的成本越大,因此其系数预期为负。各变量

① $D_{ii} = 2/3(\sqrt{area_i/\pi})$ $area_i$ 为各省面积。

的数据来源于 2003 ~ 2010 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劳动统计年鉴》以及 CCER 金融经济数据库,其中生产总值、资本形成使用各省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调整为

2002 年不变价格,工资水平使用各省居民消费价格指数调整到 2002 年价格,FDI 则同时经过各省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以及汇率调整。

表 1 各变量涵义说明

变量	符号	变量说明
出口	<i>export</i>	各省出口总额(千万元)
外商直接投资	<i>fdi</i>	各省的外商直接投资实际利用外资金额(万元)
市场规模	<i>masi</i>	各省的国内生产总值(亿元)
开放度	<i>open</i>	各省的进出口总额占各省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
制造业平均工资	<i>awwa</i>	各省的制造业平均工资(元)比去年末制造业就业人数(元/人)
劳均资本	<i>capw</i>	各省的资本形成总额比去年末各省就业总人数(元/人)
至海岸线距离	<i>coast</i>	计算公式为 $coast_i = 100 / (\min D_{ij} + D_{ii})$, 其中 $\min D_{ij}$ 为各省到最近的沿海省份的距离, D_{ii} 为各省的内部距离
金融发展	<i>fina</i>	[各省的贷款总额 $\times (1 - \text{国有工业企业的利息支出} / \text{全部工业企业的利息支出})$] / GDP (%)
对外依赖度	<i>exde</i>	各地区实收资本中外资的比例(%)
国家干预度	<i>stin</i>	各省地方财政决算本级支出占地区国内生产总值比重(%)

表 2 各变量统计分析

变量	观测值	平均值	方差	最小值	最大值	预期符号
<i>export</i>	248	16000	39000	0.132	270000	Na
<i>fdi</i>	248	360000	520000	75.27	2.800e+06	?
<i>masi</i>	248	7414	7052	162.0	39000	+
<i>open</i>	248	0.0380	0.0560	0	0.244	+
<i>awwa</i>	248	15000	6447	4927	42000	?
<i>capw</i>	248	2485	3491	327.1	28000	?
<i>coast</i>	248	0.385	0.411	0.0350	1.884	-
<i>fina</i>	248	0.0320	0.0220	0	0.132	Na
<i>exde</i>	248	0.151	0.148	0.00200	0.566	Na
<i>stin</i>	248	0.160	0.151	0	1.065	Na

2. 估计结果与实证分析

首先,在固定效应与随机效应的选取上,对计量式子(1)的估计,根据豪斯曼检验来确定,其中中部地区、西部地区以及全国整体符合固定效应假设,而东部地区豪斯曼检验的相伴概率为 0.505,因此选用随机效应。其次,国内对贸易的研究往往只注重国家之间因运输距离而产生的贸易成本,而忽略了国内的运输距离也会影响贸易成本,因此本文引入至海岸线距离来控制国内的运输成本,至海岸线距离是可观测的且在经济意义上能影响出口的变量,但固定效应无法估计不随时间变化的变量影响,因此对计量式子(2)使用随机效应进行估计。第三,面板数据能在一定程度上避免遗漏变量带来的内生性问题,但无法解决联立性内生性问题,因此对主要解释变量实际利用外资(*fdi*)选滞后一期值作为工具变量,进行两阶段的工具变量估计。对于工具变量估

计,当原变量存在内生性时,工具变量的结果更优。但如果原变量不存在内生性时,原模型估计结果更优,豪斯曼检验不仅能判断模型适用于固定效应还是随机效应,也能判断模型的内生性,因此对工具变量模型也进行了豪斯曼检验。表 3 报告了各自的回归结果,模型 [1]、[2]、[5]、[6]、[9]、[10]、[13]、[14] 为加入海岸线变量的随机效应估计结果,模型 [3]、[4]、[7]、[8]、[11]、[12]、[15]、[16] 为剔除海岸线变量的估计结果,其中模型 [2]、[4]、[6]、[8]、[10]、[12]、[14]、[16] 为使用两阶段工具变量估计结果。在包含海岸线变量的模型中,模型 [2]、[6]、[14] 豪斯曼检验的伴随概率分别为 0.364、0.701、0.206,无法拒绝原模型中变量的外生性,因此模型 [1]、[2]、[13] 估计结果要优于模型 [2]、[6]、[14],而模型 [10] 的豪斯曼检验的伴随概率为 0.000,显著地拒绝了原模型中变量的外生性,因此

模型 [10] 估计结果优于模型 [9]。同理,在包含海岸线变量的模型中,模型 [7] 的估计结果优于模型 [8],而模型 [4]、[12]、[16] 估计结果要优于模型 [3]、[11]、[15]。

表 3 的估计结果显示:从全国整体情况看,流入我国的 FDI 对出口具有显著的负向作用。2002~2009 年期间,流入我国的 FDI 在整体上体现为市场寻求的水平型,我国外资利用政策正从利用垂直型 FDI 为主转向利用水平型 FDI 为主,这也是我国产业结构调整的结果。垂直型 FDI 所进入的大多是劳动密集型产业,这在我国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情况下能够促进经济增长,但在我国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后这些劳动密集型产业也将成为我国的比较劣势产业。从分地区的估计结果看,东部地区的 FDI 对出口有显著的负向作用,而中部地区 FDI

对出口则没有显著的关系,西部地区则具有显著的正向关系。这验证了本文的假设,即我国东部地区劳动力成本的比较优势正在慢慢弱化,东部地区开始凭借市场规模的扩大吸收水平型及混合型 FDI。西部地区由于工资水平最低,劳动力成本的比较优势比较明显,因此西部开始成为垂直型 FDI 的目标。中部地区 FDI 对出口的作用不显著,说明中部地区 FDI 的性质介于垂直型与水平型之间。其次,从各个控制变量的估计结果看,全国整体与分地区的市场规模 *masi* 估计系数显著为正,开放度 *open* 的系数也显著为正,这都同符合前文的预期;至海岸线距离 *coast* 的估计系数显著为负,说明距离海岸线越远,出口的成本就越大,这不利于出口,也不利于出导向战略的垂直型 FDI 流入。且从分地区的估计结果来看,西部地区至海岸线距离对出口的影响最大,

表 3 我国各地区外商直接投资与出口额估计结果(续表见下页)

被解释变量: <i>export</i>	东部地区		东部地区		中部地区		中部地区	
	[1]优	[2]IV	[3]	[4]IV 优	[5] 优	[6] IV	[7] 优	[8]IV
<i>fdi</i>	-0.016** (-2.431)	-0.018* (-1.762)	-0.015* (-1.655)	-0.012** (-2.341)	0.001 (0.738)	0.000 (0.081)	0.001 (0.438)	-0.001 (-0.359)
<i>masi</i>	3.813*** (7.055)	3.600*** (5.753)	2.637*** (4.616)	2.443*** (5.130)	0.387*** (4.911)	0.395*** (3.902)	0.345*** (3.478)	0.366** (2.437)
<i>open</i>	6.7e+05*** (7.465)	6.9e+05*** (7.339)	4.6e+05*** (6.010)	4.8e+05*** (6.378)	2.6e+05*** (10.150)	2.7e+05*** (9.213)	2.8e+05*** (9.986)	3.0e+05*** (9.134)
<i>awwa</i>	-0.030 (-0.058)	0.326 (0.547)	0.007* (1.887)	0.008** (2.385)	-0.027 (-0.956)	-0.010 (-0.320)	-0.004 (-0.122)	0.022 (0.575)
<i>capw</i>	0.167 (0.208)	0.359 (0.436)	0.662 (1.020)	0.834 (1.340)	-0.037 (-0.631)	-0.029 (-0.461)	-0.007 (-0.112)	0.003 (0.051)
<i>coast</i>	-3.4e+04** (-2.190)	-4.2e+04** (-2.439)	—	—	-21.191 (-0.014)	-337.223 (-0.197)	—	—
<i>cons</i>	-2.0e+04 (-1.624)	-1.8e+04 (-1.443)	-3.0e+04*** (-2.681)	-3.2e+04*** (-3.109)	-2.5e+03*** (-4.235)	-2.7e+03*** (-4.128)	-2.8e+03*** (-6.936)	-3.3e+03*** (-6.671)
N	80	70	70	80	72	63	72	63
R ²	0.6257	0.5575	0.607	0.669	0.8754	0.8537	0.8781	0.8575
wald	0.000	0.000	(F) 0.000	0.000	0.000	0.000	(F) 0.000	0.000
省份效应	随机效应	随机效应	随机效应	随机效应	随机效应	随机效应	固定效应	固定效应
Hausman 检验(固定与随机应选择)	—	—	0.505	—	—	—	0.078	—
Hausman 检验(内生性检验)	—	0.364	—	0.087	—	0.701	—	0.446

注: *、**、*** 分别表示在 10%、5% 和 1% 的水平上显著,括号中的数值是 t 统计量值。(F) 表示 F 检验伴随概率结果。其中,东部地区包括北京、天津、河北、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海南;中部地区包括山西、内蒙古、吉林、黑龙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西部地区包括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西藏、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

续表 3

被解释变量: <i>export</i>	西部地区		西部地区		全国		全国	
	[9]	[10] IV 优	[11]	[12] IV 优	[13] 优	[14] IV	[15]	[16] IV 优
<i>fdi</i>	0.003 (1.115)	0.006* (1.673)	0.008** (2.276)	0.014*** (2.945)	-0.013*** (-3.231)	-0.010 (-1.539)	-0.014*** (-3.313)	-0.015** (-2.026)
<i>masi</i>	0.549*** (5.994)	0.485*** (4.874)	0.500*** (2.693)	0.240 (0.963)	3.763*** (12.727)	3.514*** (9.609)	3.951*** (12.202)	3.708*** (9.326)
<i>open</i>	1.6e+05*** (15.034)	1.5e+05*** (13.410)	2.0e+05*** (14.953)	1.9e+05*** (11.436)	4.9e+05*** (9.455)	4.3e+05*** (7.541)	3.7e+05*** (5.340)	2.3e+05*** (2.955)
<i>awwa</i>	0.078** (2.500)	0.090*** (2.587)	0.040 (0.982)	0.072 (1.493)	-0.707*** (-4.387)	-0.609*** (-3.585)	-0.724*** (-4.120)	-0.557*** (-3.044)
<i>capw</i>	0.018 (0.423)	0.017 (0.383)	0.040 (0.959)	0.037 (0.813)	-0.455* (-1.739)	-0.417* (-1.654)	-0.605** (-2.280)	-0.572** (-2.287)
<i>coast</i>	-8.8e+03*** (-5.304)	-7.5e+03*** (-4.075)	—	—	-2.2e+04*** (-2.634)	-1.6e+04* (-1.732)	—	—
<i>cons</i>	-2.2e+03*** (-3.711)	-2.4e+03*** (-3.582)	-4.6e+03*** (-8.501)	-4.4e+03*** (-6.447)	-4.9e+03 (-1.167)	-5.9e+03 (-1.261)	-9.2e+03*** (-2.626)	-4.2e+03 (-1.098)
N	96	84	96	84	248	217	248	217
R ²	0.8822	0.8534	0.8948	0.8553	0.5611	0.5074	0.5673	0.5228
省份效应	随机效应	随机效应	固定效应	固定效应	随机效应	随机效应	固定效应	固定效应
wald	0.000	0.000	(F) 0.000	0.000	0.000	0.000	(F) 0.000	0.000
Hausman 检验(固定与随机应选)	—	—	0.057	—	—	—	0.000	—
Hausman 检验(内生性检验)	—	0.000	—	0.013	—	0.206	—	0.003

注: *、**、***, 分别表示在 10%、5% 和 1% 的水平上显著, 括号中的数值是 t 统计量值。(F) 表示 F 检验伴随概率结果。

说明距离对出口抑制作用随着距离的增加加速递增; 制造业的平均工资对出口的作用在整体估计时有显著的负向作用, 说明我国整体产业结构还是偏向劳动密集型, 工资对企业的竞争力影响较大。但分地区估计时, 东部地区模型 [4] 有显著的正向作用, 其原因是东部地区开始转向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 这些产业的核心竞争力不在劳动力成本, 主要体现在人力资本积累、技术进步上, 而人力资本积累本身就要求工资的提高; 劳均资本 *capw* 系数在整体回归时显著为负, 说明我国出口的产品还是以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 当资本要素密度上升时出口减少。分地区估计中东部地区系数为正, 中西部地区为负, 说明东部地区相对资本密集而中西部相对劳动力密集, 这也符合预期。

三、我国 FDI 性质的门槛检验

本文第二部分在考察 FDI 性质时使用的是按地区

分组的方法, 然而该方法无法回避的问题是分组的指标并不全面, FDI 流入的性质还要受到我国各地区多种条件因素的制约, 如各地的金融发展水平、各地的国家干预等。这些因素对 FDI 流入的性质可能都存在非线性形的“门槛”效应, 即当各地区跨过某一门槛时, FDI 的性质也会有明显的不同。我们采用门槛模型 (Hansen, 1999) 来进一步完善我们的实证分析。选择一个门槛变量 q_{it} , 当存在一个门槛水平 r , 使得 $q_{it} > r$ 与 $q_{it} \leq r$ 时, 流入我国的 FDI 性质出现显著的差异, 那么设置虚拟变量 D_{it} : $D_{i1} = \begin{cases} 0 & q_{it} \leq r \\ 1 & q_{it} > r \end{cases}$, $D_{i2} = \begin{cases} 1 & q_{it} \leq r \\ 0 & q_{it} > r \end{cases}$ 则原回归模型变为非线性模型:

$$export_{it} = \eta_i + \beta_1 D_{i1} fdi_{it} + \beta_2 D_{i2} fdi_{it} + \beta_3 z_{it} + \varepsilon_{it} \quad (2)$$

其中 z_{it} 为文中已经解释过的控制变量。当存在 n ($n \geq 1$) 个门槛时, 则依此类推设置 $n+1$ 个虚拟变量 $D_{i1}, D_{i2}, D_{i3}, \dots, D_{in+1}$ 。门槛回归分析中最为关键的一步是找出门槛变量的门槛数以及相对的门槛值, 借鉴

Hansen(1999)的方法,对面板模型首先要消除个体不可观测因素影响,先对(2)式去组内均值得到:

$$export_{it}^* = \beta_1 D_{i1} fdi_{it}^* + \beta_2 D_{i2} fdi_{it}^* + \sum \beta_m z_{it}^* + \varepsilon_{it}^* \quad (3)$$

然后将不同的门槛值 r 代入(3)进行 OLS 回归得到相应的残差平方和 $s_n(r)$,取多少个不同的 r 就能得到多少个残差平方和,而对应的残差平方和最小的 r 则选为门槛值,当残差平方和非单调性时可能存在多于一个的门槛值。如图 1 q_1 、 q_2 为可能的两个门槛值。得到门槛值之后使用 F 检验对其进行有效性的检验,原假设为 $H_0: \beta_1 = \beta_2$,对应的备择假设为 $H_1: \beta_1 \neq \beta_2$,当拒绝原假设时门槛值有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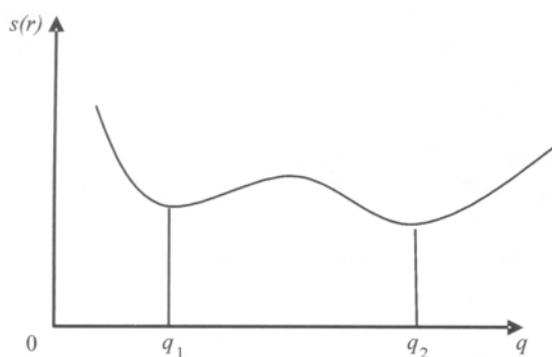


图 1

我们综合考虑各地区的金融发展、对外依赖、国家干预等因素来检验它们是否对 FDI 的性质有门槛效应。表 4 报告了各变量的门槛估计结果。

1. 金融发展

金融发展是衡量一个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在当今多变的经济与社会环境下,企业发展面临的不确定性大大增加,良好的融资环境能够帮助企业渡过困难期,减少企业经营的不确定性,也有利于企业对市场机会的把握。对我国的国有企业来说,因其特殊的国家背景以及我国信贷的行政干预,国有企业并不缺乏融资服务,因此我们以非国有企业获得的贷款占 GDP 的比例来衡量各个地区的金融发展水平。本文借鉴黄玖立、洗国明(2010)的方法,使用“国有工业企业的利息支出/全部工业企业的利息支出”指标衡量国有部门获得信贷比例,并以此计算出非国有部门获得的信贷额度。表 4 结果显示,我国 FDI 对出口的作用在不同的金融发展水平下有两个显著有效的门槛,第一门槛值为 0.026,当金融发展水平越过该门槛时,FDI 对出口的系数从 -0.006 变为 -0.061,FDI 对出口的抑制性加强,说明金融发展越过这个门槛后更有利于水平型 FDI 的流入,其原因在于水平型 FDI 以资本、技术为核心竞争力,其发展面临的不确定性更强,其对金融方面的服务

需求也更为强烈,而垂直型 FDI 主要是为了寻求低成本地区进行低技术的生产环节,金融服务则显得不那么重要。第二门槛值为 0.030,迈过这个门槛后 FDI 对出口的系数从 -0.061 变为 -0.008,FDI 对出口的抑制性回落,但是仍然大于第一门槛前的情况,同时我们对第一门槛与第二门槛发现二者之间的差距很小,而落入这个区间的样本点也很少,这可能是少数异常样本造成的后果。

表 4 各变量的门槛效应估计结果

	金融发展	对外依赖度	国家干预
门槛值 r_1	0.026***	0.3802***	0.086***
门槛值 r_2	0.030***	0.5061***	0.111***
<i>masi</i>	2.824*** (6.380)	3.554*** (13.882)	4.213*** (13.296)
<i>open</i>	2.27e+05*** (3.683)	2.27e+05*** (4.304)	2.16e+05*** (3.352)
<i>awwa</i>	-0.321*** (-1.896)	-0.700*** (-5.111)	-0.636*** (-4.003)
<i>capw</i>	-0.346*** (-1.610)	-0.814*** (-4.106)	-0.547** (-2.335)
<i>fdi</i> ($q < r_1$)	-0.006*** (-0.615)	-0.010*** (-2.820)	0.013*** (2.608)
<i>fdi</i> ($r_1 < q < r_2$)	-0.061*** (-5.525)	-0.027*** (-7.353)	-0.007 (-1.362)
<i>fdi</i> ($q > r_2$)	-0.008*** (-1.461)	0.0241*** (4.753)	-0.024*** (-6.009)
F	88.115(0.000)	24.100(0.000)	21.750(0.000)

注: **、***,分别表示在 5% 和 1% 的水平上显著,括号中的数值是 t 统计量值。

2. 对外依赖度

对外依赖度指标以各地区实收资本中外资的比例来表示。对外依赖度对地区发展既有积极的影响也有消极的影响,外资对当地的技术进步、人力资本积累等方面都有积极影响,但对外依赖度高也说明该地区发展的自主权低,这不利于地区产业结构的调整,同时外资对内资也存在挤出作用。表 4 结果显示,对外依赖度存在两个显著有效的门槛,当对外依赖度越过第一个门槛时,FDI 对出口的系数从 -0.010 变为 -0.027,FDI 对出口的抑制性加强,说明流入的水平型 FDI 增加;当对外依赖度越过第二个门槛时,FDI 对出口的系数变为 0.0241,FDI 的性质转变为以垂直型为主,其原因可能是对外依赖度能够增加地区的国际化水平,这会使地区的制度与国际接轨,促使具有先进技术的跨国公司来投

资。而对外依赖度过高则表示当地过于依赖外资,而外资流向低端产业的惯性无法得到有效的抑制,这阻碍了地区产业向资本、技术密集型的转型,使得地区的产业结构始终处于低端,这样吸引的 FDI 也自然以垂直型为主。

3. 国家干预

国家干预使用各省地方财政决算本级支出占地区国内生产总值比重表示。国家干预对地区的作用也存在积极与消极两方面,正确的国家干预能引导有利于地区产业升级的 FDI 流入,而低效的国家干预则可能重复将 FDI 引入低端产业。从表 4 的结果可知,国家干预存在两个显著有效的门槛 0.086 与 0.111,且随着门槛值的提高,FDI 对出口的系数从 0.013 变为 -0.024,FDI 对出口的抑制性加强,说明我国政府对 FDI 的引导是以水平型为主的,这说明我国在确定增长方式转变以及产业结构升级的目标后,政府确实是在往这个方向努力。

四、结论与政策建议

我国不仅存在刘易斯提出的相对发达的工业部门同相对落后的农业部门并存的二元经济结构,也存在着缪尔达尔提出的不发达地区同发达地区并存的区域二元经济结构,而这双重的二元经济结构对流入我国 FDI 的性质也有重要的影响。改革开放后,我国放开了农民进城的限制,大量农民工涌入城市,我国的劳动力禀赋比较优势十分明显,这吸引了大量以降低生产成本、转移低端劳动密集型产业为目的的垂直型 FDI 流入到我国。随着“民工荒”现象的出现,我国也告别了劳动力无限供给的时代,这引起了流入我国的 FDI 的性质变化。

本文的政策建议主要为:要以动态的眼光来看待我国劳动力成本比较优势的变化。随着刘易斯拐点到来,我国东部地区劳动力成本比较优势正在丧失,东部地区不仅面临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同时也面临利用外资方式的转变。东部地区劳动密集型产业要向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发展,要吸引更多具有先进技术的水平型 FDI 的流入;中西部地区则要开始注重利用劳动力成本优势,承接东部地区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转移,同时吸引垂直型 FDI 的流入;我国要更加偏向具有技术优势的水平

型 FDI 的引进,而不能陷入“比较优势陷阱”,沦为世界的组装工厂。

参考文献

- [1] 黄玖立,李坤望. 出口开放、地区市场规模和经济增长[J]. 经济研究, 2006(6).
- [2] 黄玖立,冼国明. 金融发展、FDI 与中国地区的制造业出口[J]. 管理世界, 2010(7).
- [3] 李季,赵放. FDI 与垂直型产业内贸易实证研究——基于中日统计数据 Granger 因果检验[J]. 世界经济研究, 2011(7).
- [4] 李宏艳. FDI 对中国垂直专业化地位的影响[J]. 当代财经, 2008(6).
- [5] 文东伟,冼国明. 垂直 FDI、区位选择与工资差异[J]. 南开经济研究, 2009(6).
- [6] 薛漫天,赵曙东. 外商直接投资:垂直型还是水平型? [J]. 经济研究, 2007(12).
- [7] 颜银根,安虎森.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立后 FDI 流入能替代进口贸易吗? ——基于新经济地理贸易自由化的研究[J]. 经济评论, 2011(4).
- [8] 周文波. 国际贸易与 FDI 关系的发展轨迹:替代、互补与融合[J]. 企业经济, 2010(2).
- [9] Ge, Ying. Regional Inequality, Industry Agglomeration and Foreign Trade, the Case of China. Working Papers, University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and Economics, China, 2003.
- [10] Hansen, B. E. . Threshold Effects in Non-Dynamic Panels: Estimation, Testing and Inference. Journal of Econometrics, 1999, 93(2): 345-368.
- [11] Lewis, W. A. . Economic Development with Unlimited Supplies of Labour. The Manchester School, 1954, 22: 139-191.
- [12] Markusen, J. R. . The boundaries of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s and the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trade.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1995, 9(2): 169-189.
- [13] Myrdal, G. . Economic Theory and Underdeveloped Regions. London: Duckworth, 1957.
- [14] UNCTAD. World Investment Report: 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s and Integrated International Production. Geneva: United Nations, 1993.
- [15] UNCTAD. Trade and development report. Geneva: United Nations, 1998.

(责任编辑:王丽娟)

FDI Heterogeneity under China's Double Dual Economic Structure*Xu qing*(53)

China's double dual economy have an important impact on the nature of the inflow of FDI. The empirical results show that the utilization of foreign capital of eastern China in 2002 ~ 2009 in order to bring greater technology spillovers and promote the upgrading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of horizontal FDI . The FDI nature of China's central region is not clear , and the western regional foreign capital is mainly vertical. Finally , the paper tests the nature of China's FDI again using threshold regression. The results show that different level of financial development , external dependence and the degree of state apparent threshold effect.

Cost , Endowment and Outward FDI from Chinese Manufacturing: A Study based on an Extended KK Model*Wang Jian Luan Dapeng*(60)

This paper extends the classical KK model by discriminating six types of firm structures. Results of numerical simulation show that different structures of potential firm or MNE will emerge in domestic country with different factor endowments in equilibrium , and the results are given medium trade costs and medium relative firm-level cost. It is implied that investment of Chinese manufacturing firms into more underdeveloped countries is based on their technology advantages , and in similar emerging economies is to reduce trade costs , while that into developed countries depends on national advantages of low-cost labor.

An Analysis on the Background and the Impact of the Third Round of U. S. Quantitative Easing Policy*Lin Jue*(67)

September 2012 , the Fed announced the QE3 measures to stimulate economy. The United States wished to encourage loan and expenses to reduce the unemployment rate and to promote the economy out of the doldrums growth by the way. The plan is different from the previous one with deadline. It does not set the time to take action until the economy improves. The U. S. has already debt-ridden. Will the purchase of a large number of bonds promote inflation further? How is the state of the U. S. economy? What is the background of the re-launch of the EQ3 policy? What kind of impact of the QE3 may be brought to the other countries especially China's economy? The paper also studied the above questions.

Influence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Transformation on Economic Fluctuation of Japan: Smooth or Not?*Ding Zhenhui Zhang Meng*(74)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 transformation is a doomed phenomenon during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By introducing the Moore structural index which authentically described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 development tendency , this paper found that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 varied in different periods. A variable coefficient state space model showed that in most of the time industrial structure transformation smoothed the economic fluctuation and capital and labor shocks played an opposite role. On considering the history of Japan , it suggested that in order to minimized the potential output loss resulted of inter-period volatility , the following measures should be more noticed: more attention be paid on the tertiary industry and industrial structure adjustment , especially on the factor respect.

An Research on Industrial Agglomeration and Balance Effect based on China ASEAN Free Trade Zone*Long Yun-an*(80)

The research purposes investigating China's free trade development strategy , implementing China and neighboring countries trade integration , and promoting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RMB. By the application of spatial economics theory model , it studies the free trade area of the industrial agglomeration process and results , and through the double difference method to verify the related research conclusions. The results show that small starting mode "CAFTA" changes "Core-Periphery" negative effect of traditional pattern , which makes the regional industry development tend to balance , CAFTA model construction accelerates the inter industry trade between members. So , the conclusions are that the conflicts are reduced by free competition mechanism and policy coordination mechanism in member states , and the industrial deformity is avoided , thus it promotes the balance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members.